

2 路通中原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原之后，挥鞭南下，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共有三次重大的战役，从公元前 219 年开始至公元前 210 年结束，促成了中华民族大统一，同时，更把岭南地区的开发建设推入了一个新纪元。

古籍中对秦始皇的“秦戍岭南”记述各异，但有一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淮南子·人间训》中所记的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呈宋。而越人皆入丛藻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

《史记·平津侯主父传》中记述：“秦始皇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赵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径于道树，死者相望。”

从《淮南子》作者及《史记》作者的着眼点来看，反映出两个事实，一是瓯越之地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二是秦始皇要着意向海外开拓。

在商周时期，包括合浦在内的瓯骆越地就以盛产犀角、象齿、翡翠、

珠玕而闻于中原朝廷，商汤为此授命伊尹作四方令，指定包括合浦在内瓠骆地以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为献”。合浦自古以来就出产象、犀、翠（鸟），更是珍珠的主产地，合浦关于这方面特产的记述不绝于史书。直至清代，如清代李调元所著的《南越笔记》中就这样记述：“孔雀产高、廉雷、罗定诸处。截其尾、编列瓶中，足供玩饰。”而唐代项斯所作的珠市风情诗歌《蛮家诗》中，则有“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等描述。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所述的“桂出合浦”，唐《酉阳杂俎》中所述的“合浦有鹿”等。至于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关于合浦珍奇物产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秦始皇不惜倾全国之力南取百越，看重的当然不只是百越的珍奇物产，还有以合浦郡境地为主的打通海外交通重要的地理位置与作用。这与秦始皇对大海的向往和情结有很大的关系，也是秦始皇海疆战略的重要部分，从秦始皇灭六国后的十年间五次出巡及几个重大决策中可见其中因素。

秦始皇在平息南方的战争中就曾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在位的12年（前221—前210年）中，先后组织五次大规模巡游，其中四次是巡游海上。

第一次巡游海上的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这是我国古代史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航海。秦始皇东巡郡县，首先上邹峰山（山东邹县境内），立石颂功德，然后封（筑坛祭天叫封）泰山（今山东泰安等县境），禘（辟基祭地叫禘）梁父（泰山下的小山），再东游海上，至渤海湾的黄（今山东黄县）、睡（今山东福山县）两港，又东到成山（今山东半岛成山头），芝罘（今山东烟台）立石，颂秦德。由此南行到琅琊港（今

山东胶南南境) 留住三月, 建琅琊台, 下令自内地迁徙百姓三万户于琅琊台下, 免征 12 年赋税; 立碑, 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在东巡途中, 齐人方士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有仙人及不死药, 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 于是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因事本虚妄, 徐福等乃谎言“因风未能至, 望见之焉”。

第二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前 218 年)。当秦始皇车队至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南)时, 韩国贵族张良令力士持铁锥伏击, 误中副车。始皇遇刺未中, 令大索十日, 未得凶手。而后, 又登芝罘, 刻石立碑, 归途中再次来到琅琊港。



图 2-1

建于宋代的廉州古城北大楼城脚遗址。

第三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南昌黎海中, 一说在今河北乐亭西南, 一说在今山东无棣), 刻石立碑。为追求长生不老又使燕人方士卢生入海求羡门、高誓等古仙人, 不得而还。第二年, 命将军蒙恬发兵 30 万, 北击匈奴, 收复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今内蒙河套及伊克昭盟地区), 设 44 县。为防匈奴侵扰, 秦始皇又征发

大量民工将燕、赵、秦旧时长城连接修成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北）。为解决北方粮饷，乃开辟北方航路起于黄睡、琅琊、入渤海，转道今天津附近古黄河，经水运转输。

第四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始皇东巡，南至九疑（一作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南宁南，相传虞舜葬此），祀虞舜，浮长江而下，经丹阳（今安徽当涂）、钱塘（今浙江杭州），过浙江，登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今东海），立石颂德。北归时，路过吴地，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北）渡江，乘海船北上琅琊，至成山、芝罘。至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南）时，病。（十月为岁首）死于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西北）。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不久就多次巡游海上，是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的。当时，齐、燕、越等沿海之地新并不久，六国遗民充满仇视心理，妄图复国，秦始皇不得不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进行招抚工作，加强统治，以防政局不稳。秦始皇在泰山碑文上写道：“既平天下、不懈于治。”他移民改俗，屯戍海防。如把越人强行迁徙到江、淮、徐、泗地区，把内地囚徒迁到越，开荒种地；刻石立碑，炫耀威德，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航海力量支持边防军事所需。不仅要发展中原以外的经济，而且要通过沿海港口向外谋取经济利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就取得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秦始皇多次航行于江、河、湖、海，如果没有较前代发达的造船航海业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十年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重大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始皇决策重点：一是统一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二是解决与匈奴的战争；三是南取百越，打开出海通道。

南取百越是秦始皇海疆战略中的关键环节。

秦始皇南取百越，从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二十八年，也就是秦始皇第二次出巡之年）到公元前 214 年，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战争，史称为“秦瓠战争”、“秦戍岭南”或“秦始皇三征岭南”。在这三次战争中，战况最惨烈的是第一次战争，即公元前 219 年开始发动的南征百越之战。在这一战，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确立了中华大一统格局。对秦始皇乃至武帝的海疆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是第二次战争，即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任嚣、赵佗率军攻占百越，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大秦帝国因此拥有了南海、北部湾这两大海域。第三次是赵佗并击南海、桂林、象郡，时在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三十七年），是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中途死于沙丘。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为赵佗建立南越王国奠定了基础。

这次“秦瓠战争”或“秦瓠之战”，在《广西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是这样记载的：

秦瓠之战，秦朝征服百越各部的军事行动。秦始皇为开拓疆土，于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命尉屠睢率 50 万大军，分兵 5 路进攻百越。一路经余干（今属江西）征服了东瓠（今浙江温州）和闽越（今福建），并设置闽中郡。二路戍守南野（今江南南康境）以南的大庾岭。三路由番禺（今广东广州）进军。五路进攻镡城（今湖南靖县境）。四路由主帅屠睢率领，发动秦瓠之战，率军逾越城岭，经湘桂走廊，迅速控制漓江通道。九嶷（今湖南宁远县南）之军沿古道进入今广西钟山、贺县一带，与屠睢部会师。因粮饷接济不上，被迫停止进攻。

当时的合浦郡境内在其中处于什么样地位，特别是秦始皇开凿了灵渠之后，对合浦郡境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合浦因此发挥过什么作用及影响？

在史籍记述，秦始皇是分兵五路向岭南进军的。而在此前，秦始皇的军队挟灭六国的余威平定了于越，设置会稽郡，这为秦军大举南征提供了一个支点。因此，秦军一路驱兵直入，顺风南下，没有受到大的抵抗。秦军五路大军的战略目标，根据《壮族通史》的记述是：“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今萌渚岭），一军处番禺之都（今骑田岭），一军守南野之界（今大庾岭），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省余干水上游）。”秦军的第一路军是从今广西北部的兴安县边境的越城岭向南突进，由此直下桂江；第二路军是从湖南省江华境内的萌渚岭向南挺进，由此到达广西的贺县一带；第三路军是越过骑田岭进入广东省的西北部，沿连江南下，向番禺推进；第四路军是从江西和广东两省交界的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地区；第五路军则集结在江西省上犹江（即余干之水）一带，作为后援部队，同时也为防止闽越余部前来支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而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并且对进攻的路线及其战略战术作了周密的部署，兵分五路，形成从东面和北面夹击之势，企图在漫长的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岭南越人发起凌厉的攻击，以便将其各个击破，达到一举攻克的目的。

当时岭南地区为百越族群的分支——西瓯、骆越和南越等土著居民的聚居地。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其地越人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大抵到了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原始社会才开始解体，逐步进入阶级社会，但其社会组织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制度。由

于长期而频繁的部落战争，使得当地越人具有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善于在山地或从林中作战。当秦军的四路大军向岭南挺进后，从骑田岭和大庾岭南下广东的第三、第四路军进展较为顺利，沿途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岭南要地番禺（今广州）。而从越城岭挺进的第一路军和从萌渚岭南下的第二路军则严重受阻，他们一越过岭就遭到西瓯部落的顽强阻击。在交战之初，由于西瓯人缺乏抗击秦军大举进攻的足够准备且力量分散，当秦军浩浩荡荡挺进其领地之时，他们只是仓促应战，结果被秦军的凌厉攻势打得四处溃逃，其部落首领译吁宋也在混战中遇害身亡。但有着顽强斗志和丰富经验的西瓯人在初次受挫后并不气馁，当他们惊魂稍定后便迅速集结起来，“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以为将”，继续抗击秦军。西瓯人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地形、善于爬山越岭和击水荡舟的特长，利用当地山高林密和河沟深险的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夜战的方法，从各个地点伺桃对秦军的营地及供应线频频进行袭击，使人生地不熟的秦军大兵团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困境，不仅无法正面攻击西瓯人，反而使自己不断地损兵折将，连其主帅尉屠睢也被西瓯人斩杀，造成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严重损失。西瓯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绩，紧紧地牵制了秦军的主力，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给养困乏，被动挨打，“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的被动局面。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秦军不得不收缩兵力，反攻为守，筑城固守待援。面对这种战局，秦始皇也不便冒进，只好增派“尉佗将卒以戍越”。从此，秦瓯之战进入了“三年不解甲驰弩”的相持阶段。



图 2-2

南流江主要的出海港口——三汊港。

为扭转孤立无援、被动挨打和给养困乏的不利局面，早日完成对岭南的统一，秦始皇于三十年（前 217 年）令监御史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史禄率领秦军和广大民工在广西兴安县开凿了沟通漓江和湘江水运的秦凿渠（后来称为灵渠）。秦凿渠修好后，保证了给养和援兵从湘江源源不断地运抵岭南，于是，秦始皇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征调大批的中原人民充当士卒前来岭南与西瓯人作战，“丁男被甲，丁女转输”，以支援前线；原固守在西瓯地区各据点的秦军，由于得到从湘江经灵渠不断运送来的兵员和给养的增援补充，实力大为增强，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末或三十三年初，秦始皇又派遣名将任嚣和赵佗率领秦军向西瓯人发动了新的攻击。在秦军凌厉的攻击下，西瓯人虽浴血奋战，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了。秦军击败西瓯人并占领其地之后，继续向西瓯、骆越的腹地进军，所向披靡。经过长达 6 年的艰苦征战，到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终于统一了岭南地区。这场战争虽然给岭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

破坏，秦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客观作用来看，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是一项有利于祖国统一和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事业。从此以后，岭南的越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岭南地区亦成为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处于中央王朝的统一治辖之下。

秦始皇在岭南地区建置的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有关情况，据后人考证，桂林郡治所在布山（今广西贵港市），其郡所辖区域主要在广西境内，四至为：东起于今广东肇庆，与南海郡西界犬牙交错；西抵今广西田东右江以北；北至今广西兴安县以南；南面濒临南海，其地包括今桂林地区中部和南部、柳州地区、河池地区东部、百色地区东北部、南宁地区中部和北部、玉林地区北部、梧州地区西北部以及广东西部。

象郡的治所在今越南北部，其辖地包括今越南中部和北部以及广西西部和广东西部的部分地区，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其四至是：东自广东湛江、海康，与桂林郡和南海郡地相接；西至今越南长山山脉以东，与句町国地襟连；北起今广西右江一线，与桂林郡西边相接；南抵今越南富安省南境。

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州市），其辖地主要在今广东境内。其四至：东及南面滨南海；最西抵今广西贺县，与桂林郡东界相交错；北自今韶关、南雄、乐昌，与长沙郡、九江郡和闽中郡地接壤。

从《壮族通史》的考证中可知秦始皇南取百越后，设置岭南三郡区域的基本概况。在岭南三郡中，合浦郡境地处于象郡与南海郡之间。以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区域状态来看，是三郡之中海岸线最长，与中原水路连接的入海江河最多的、物产最丰富的区域。

通过“秦瓿之战”，修通了运粮水道之后，合浦区位优势突显，一条以南流江流域为主干的，联通中原与大海的水运大动脉因此形成。正因为建立了这条出海通道大动脉，秦始皇南取百越的“秦瓿之战”才能够得以结束。合浦作为这条大动脉中的出海通道的港口，既是中原水运网络的终点，又是中原从海路走向世界的起点。特别是在航海环境和航海技术都处于开发阶段的先秦时期，合浦郡境内同时占有北部湾、广州湾两大避风港的优势、而且在秦王朝的所有沿海郡境中，合浦郡境地是联通南海、东南亚并通过东南亚联通印度洋诸国航海线路最安全、行程最短的。港口的保障优势、航线的安全便捷优势、物产的聚合优势，这些都是构成合浦境地成为海路对外交流中心枢纽地位先决条件。

秦国经过几代奋斗，横扫六国，威震海内，一统天下。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统一了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确立了国家的疆域。秦王政二十四年（前 223 年），秦军攻破燕国，占领了河北北部，第一次成为邻海国家。二十三年（前 224 年），秦军打败荆楚军队，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二十四年（前 223 年），又占领了淮南，进一步扩大了海疆。二十五年（前 222 年），秦“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同年“王翦遂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二十六年（前 221 年），秦吞并齐国，东海岸连成一线。三十三年（前 214 年），秦发兵占领岭南之地，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使秦的统治达到今天越南的北部，海疆延伸到南海。这样，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关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根据史籍记载，秦时海疆包括了十六郡。自北向南为：辽东郡，包括了辽宁东部和朝鲜的西北部。

辽西郡，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秦皇岛、昌黎、乐亭一带。右北平郡、渔阳郡、巨鹿郡都有临渤海的部分。齐郡临渤海，琅琊郡、东海郡临黄海，从山东半岛直达长江以北。秦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海岸线则从江浙一直延伸到越南的海防。



图 2-3

南流江出海港口之一——总江口。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海疆形成的时期。统一的海疆既是统一国家的产物，又是统一国家的象征。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海疆政策，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国力强盛，也反映了当时秦汉时期“中央王国”意识的形成和扩展自身文明的强烈愿望。

秦始皇在立国之初不惜调动五十万大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南取百越，并不是为了“利越之犀牛象角翡翠珠玑”，而是通过多次出巡之后，经过分析比较之后，而确立的在百越地区打开一条出海通道的战略决策。而合浦郡境地在秦始皇实施这一战略决策中，以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因素，承担起解决战争急需的补给通道的作用，成为秦军运粮水道补给线的终点同时，又承担起秦王朝走向世界的出海起点，顺应了秦王朝开拓海疆战争

的要求。

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即按照中原地区所推行的郡县制度，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将其地置于秦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



图 2-4、图 2-5

建于晋代的东山寺（灵觉寺），据史料记述是南越王赵佗的行宫故址。

秦王朝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还采取了派遣军队戍守各险关要塞、组织人力开辟新道以扩大通道、修城筑关防守、移民实边和发展经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秦王朝不仅将原来南征的数十万军队留守岭南，而且还不断增调兵员前来“谪戍以备之”（《壮族通史》），以扼守各险关要隘，

防范当地越人的颠覆活动。同时，秦王朝还同意赵佗派人修扩旧道，开辟新道，使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畅通无阻。秦始皇还同意赵佗的请求，特批从中原地区征调了 15000 名未婚的青年妇女，前来岭南“以为士卒衣补”（《壮族通史》），使远在岭南的中原将士安心戍边。秦王朝还不断地把中原人民迁移到岭南“与越杂处”，共同开发经济，秦王朝所采取的上述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其在岭南建立的地方政权，同时也有利于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南迁“与越杂处”的中原人民，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为推动岭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增进汉、越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两汉史籍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时合浦郡境地在历次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

（元初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

（元初三年三月）丙辰，数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夷人为贼所迫者。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后汉书·孝灵帝纪》中记：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光和四年二月）交趾刺史朱侍讨交趾，合浦乌浒蛮破之。

（中平元年六月）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趾刺史贾琮讨平之。

《后汉书·马援传》中记：

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记：

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

光和元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

《后汉书·五行志》中记：

（元初）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却略吏民。

从上述记录中可知，在先秦时期的“秦瓿之战”中，合浦郡境地虽然没有正式命名，但作为乌浒部族的群居地带，也和百越民族的其他部族一起共存共荣。从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也有一部分反映了合浦与百越民族其他部族及岭南各郡的依存关系。

1971年冬发掘的合浦望牛岭一号墓，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墓葬，墓中出土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和水晶、玛瑙、琥珀饰品共240余件，其中有两件陶提桶内壁有牛书文字，一是“九真府”字样，一件是“九真府口府”字样，由此可推知是九真郡太守生前用品。如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有许多物品是合浦境地的特产。而陶干栏、陶猪、陶谷仓、铜谷仓的型制基本相同。

秦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以农耕作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一是长城周边及西北，河西一带的畜牧经济区；二是江淮、秦岭、陇西一带的森林经济区；三是以太原、关中、巴蜀和广汉一带的农业经济区。

这三个经济区都是内陆经济区。“秦戍岭南”运粮水道的开通，不但为岭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纪元，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内陆经济与海洋经济的相结合、相融合发展，开辟了一条大通道。沿着这条大通道，中国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开始了海洋经济的开拓和发展。合浦作为这条大通道上连接中国内陆与世界的始发港口和码头所在地，也随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图 2-6

合浦汉墓发掘现场的出土文物，完好精美的竹织藤篮，里面所装的稻谷依然色泽光亮，是合浦古代农耕的见证。



图 2-7

合浦汉墓发掘现场出土罕见的拉着铜马车的青铜马。

关于赵佗建立南越王国，以《汉书·南粤传》、《汉书·陆贾传》中的记述最为经典：

《汉书·南粤传》中记：

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十三岁，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首长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亡是与谋者，故君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吏以其党为守假。秦已灭，佗即击桂林、象郡，自主为南粤武王。

《汉书·陆贾传》中记：

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

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帝说，拜贾为太中大夫。

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贾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

从赵佗并吞桂林、象郡、南海自立为南越王之后，直至其去世，岭南地区在他的治理下都是相安无事的。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使岭南地区避开了楚汉相争以及汉初诛杀诸王之乱，赢得了相对较长一段时间的偏安局面，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越王立国之初，碰到如何处理好汉、越（包括壮族先民）间民族严重对立与隔阂问题。因为秦朝统一岭南，发生了激烈的“秦瓿战争”，后来

瓯骆人失败，存在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这时赵佗兼并桂林、象郡，又伤害了西瓯、骆越人的利益和感情，激起新的矛盾。赵佗要在岭南立足，并求得有所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民族政策，以取得南越辖境的西瓯、骆越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方可安定。

赵佗制定了一套以“和集百越”为中心的民族政策，主要表现在：

团结和利用越族中的上层人物，参加王国的统治集团，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效劳。南越建国以后，就把越族中势力极大，具有很高威望的大奴隶主贵族吕嘉吸收为王朝丞相，其弟被封为将军，吕氏宗族 70 余人为长吏。另外，越族中还有许多显贵如归义侯郑严和田甲，驰义侯伺遗，越郎都稽，湘成侯桂林监居翁，瓯骆佐将黄同，僚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等等，被吸收在军队和政权中担任要职。这些人为团结广大西瓯、骆越人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辅助南越王国政权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南越王国的赵佗、吕嘉政权，实质上可以说是汉越联盟的、基本上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政权。

变服易俗，自称“蛮夷大长”，“以其故俗治”。这是赵佗在南越立国，传袭 5 代 93 年的一条颇为成功的民族政策。岭南自古就是壮族先民的发祥地，由于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服饰方面跣足左衽、断发文身、服色尚青、凿齿拔牙等；饮食方面鼻饮，喜食生猛、糯米酸菜；居住方面习居“干栏”；婚姻方面不用媒聘，踏歌为婚、不落夫家等；丧葬方面停丧葬，捡骨重葬等。这些习俗，是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代代相传，并不断充实改进，深深地浸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饱含着人们深厚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况。如果仅凭君长意志，一纸命令横加禁止，必然遭到广

大西瓯、骆越民族的反抗，导致社会动乱，明智的做法只有选择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获得人们的拥护与支持。赵佗立国以后，权衡利弊，采取了“顺其俗治，全其部落”的做法，自称“蛮夷大长”，带头“椎结箕踞”，变服易俗。史载“高祖使陆贾赐尉他（赵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结箕踞见陆生”。在赵佗的影响下，南来汉官自然也仿而效之，从衣、食、住以及婚丧习俗上改从越入风习，使原来隔阂的民族心理得到缓解，改善汉、越民族关系。当然，对于越人的一些恶习，赵佗非但不尊重，而且加以制止。如“越人好相攻击”之风，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维护社会安定，发展生产有很大的危害，赵佗运用国家机器加以制止，收到了相应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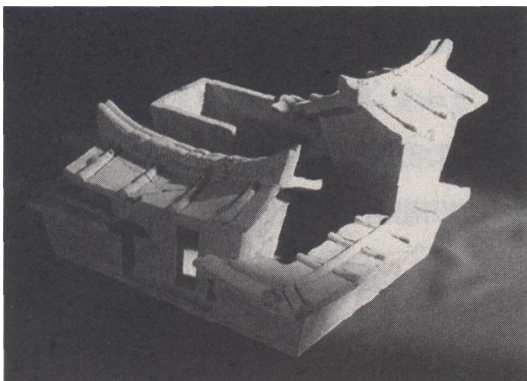


图 2-8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屋。

提倡“越汉和亲”政策，推动越、汉民族团结和睦关系的发展，这也是南越民族政策的一个核心所在。南越王室带头与越人联姻，如明王婴齐的妻出于越女，生子建德。丞相吕嘉宗族“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家弟宗室”并且还与苍梧王赵光联姻。吕嘉连相三王，“其居国中甚重，粤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南越王国密切了与吕嘉之关系，实际上就是密切了与越人之关系。因为吕嘉甚得越人的拥护。南越王国提供“越汉通

婚”，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就已开始。当时五十万秦军挺进岭南，有大量官兵留守岭南三郡，这些官兵的婚姻大成问题，所以赵佗上书要求派三万尚无成家的妇女南来“以为士卒衣补”。而秦始皇仅同意“可其万五千人”，其余大量留守官兵的配偶问题必然通过与越人妇女成婚才能解决。

推行越人“自治”的政策。自治者，即由越人自己管理内部事务，南越王朝不干预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其故俗治”。南越王国境内族群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都有自己的王、侯、将、帅等奴隶主贵族统治。赵佗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对策。在原桂林郡东部的苍梧成立苍梧王国，派同姓赵光亲自治理，以防受项羽封为衡山王的吴芮对南越的骚扰；对于地处五岭南北通道的西瓯地区，仍以其故俗治，采取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办法，继续确认原有渠帅统辖，并且还在那里封以前西瓯君的后代为西于王，让他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实行“自治”。

南越国推行的民族政策，前脱离不了秦代制度的影响，后又有仿效西汉王朝政策的一面，对壮族先民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一，缓和、消除了越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促进了两个民族的团结与合作。先秦时代，岭南越族人民虽然与中原华夏民族有着一定交往和联系，但因各族之间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而仍然“是夏则夏，是楚则楚，是越则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发动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加深了民族矛盾与隔阂。

赵佗建立南越王国后实行了上述的民族政策，缓和了越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民族团结合作关系得确立开辟了先河。南越王国在岭南能够存在

93年，与越人渠帅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两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千余年间的封建统治者在岭南逐步形成和推行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的羁縻政策，使岭南越汉民族团结和睦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图 2-9

汉墓出土的金饼，见证了墓葬者的身份非同一般。

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岭南，迁来了数十万狱吏、贾人、赘婿和力役者。他们中除了少数狱吏，大多数都是劳动群众。这些人南来“与越杂处”，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后进的民族学习先进的民族，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古往今来，各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岭南的越族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加工和处理象牙、玳瑁、珠

玕、银铜等手工产品，特别是制造铜鼓的技术，栽种水稻、瓜果、蔬菜等技术，南来的汉人到了新的环境，为了适应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必须得向越人学习，越汉两族人民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民族政策的实行，使越、汉两族人民组成了许多民族联合的新家庭。在一个共同家庭中，互相学习语言文化，互相尊重风俗习惯，男女双方以至其后代，既通汉语，又懂越语；食、衣、住、行和婚丧礼仪，越、汉并存，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民族文化。如今广东、广西的白话，就是以汉语为主，夹有不少越语成分在内的汉语，现在仍存在于壮族师公唱经、民歌、故事、账本中的古壮字，就是借用汉字的形音义，结合壮语的音韵特点构成的。婚姻习俗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交聘金，行三牲六礼等仪式，就是从汉族婚俗中吸收过来的。丧葬习俗中的拾骨二次葬，是从汉族行一次大葬的仪式移植过来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四时节日中的春节、春社、秋社、端午、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都是从汉族传人的。由于汉族最早迁入的移民大多数居住在岭南东部地区，以后又有不少汉人继续迁入，所以东部地区越族人民比较早地融合到汉族中，但秦汉时期，岭南的越人居多数，迁入的汉人居少数。越、汉通婚的家庭，其子孙后代受越人文化的濡染，数代之后，有的越化，成为越人，其比率会比越人汉化为大，成为壮侗语族中的一分子。

赵佗致力于发展南越王国的经济之外，为了争取境内的安宁稳定，他还注意搞好与汉王朝的关系，通过臣属关系从中原获得了大量的铁器、马牛等。同时，赵佗还注意搞好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如通过长沙国的互通

信息了解汉王朝对南越国政策动向，通过和闽越国恢复关系来消除敌对氛围，通过与西南夷国家的关系来扩大南越国的影响腹地等。赵佗的这些外交措施，不但维持了与汉王朝的友好关系，为南越国的发展争取了时间和机遇，也通过与其他诸侯国的多边关系，为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开辟了多渠道的合作交流。

在此期间，赵佗曾率军到合浦，在合浦留有糠头山、南越王行宫等遗址。

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在岭南地区的封建割据王朝，就是南越王国。南越王宫建在广州市。千里之外的珠乡合浦，却也留有南越王国的遗迹，一是南越王行宫，在今合浦县城廉州东山寺，一是糠头山，在今合浦石湾镇境内。

当时的合浦属象郡，处象郡与南海郡之中，是兵家必争的枢纽要地，也是越族支系力量最强大的乌浒蛮族居住地之一，赵佗深知这一点，在合浦设立行宫。

南越王行宫的规模及样貌，今已不可考。但从今东山寺的规模及位置 而看，当年南越王行宫的气势恢宏浩大，有四进，分为山门、金刚殿、大雄宝殿和观音殿。占地面积百余亩汉代的还珠亭、孟太守祠也相继建于此，晋在行宫放址建灵觉寺可见当年南越王行宫盛况。

赵佗当年为什么不远千里来合浦修建行宫，又在合浦石湾镇境内盘有糠头山的传说？

据《合浦地名志》转引的有关古籍称，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烽烟弥漫全国，引来群雄逐鹿中原，问鼎社稷，时蜀国王子也趁机兴兵东进，

抢占了时属南越王国的象郡一带。



图 2-10

东山寺的观音殿。

南越王赵佗率军征讨入侵的蜀国王子，在合浦驻军准备军粮，因此留下糠头山及南越王行宫的故事，虽然是近乎传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合浦郡境地在南越王国辖区中的特殊地位，起码传递出三个信息：一是南越王赵佗对合浦郡境地有所了解并亲临合浦郡境地。二是合浦郡境地的人们对南越王赵佗有所了解，否则不会凭空想象出一个南越王赵佗行宫。三是合浦郡境地在秦始皇时代乃至南越国时期都是军事活动频繁地区。

关于赵佗在合浦郡地留下的糠头山及南越王行宫的史迹，《合浦地名志》记载：糠头山在合浦县城西北，《元和郡县志》称粮头山，《太平寰宇记》称糠头山，《大清一统志》称为狼头山，又名军头山。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蜀国王子乘机攻占了南越国土。南越王赵佗领兵讨伐，曾驻军此地，因缺乏粮食，以糠头分士兵食用。“又西北四十里有糠头山，一名军头山，相传秦尉陀尝驻军于此，偶乏粮，以糠头散给，因名，俗称狼头山。”《太平寰宇记》记述：舂谷取米供食将士，糠头

堆积如山，因而得此名糠头山。

关于赵佗征蜀国王子的记载，还见于南北朝时沈怀远所著《南越志》。该书记述：“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亡。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国地，在今平道县东。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王有神弩，一发杀越军万人。赵佗乃与之和，仍以其子始为质。安阳王以媚妻亡，子始弩毁亡。赵兵至，乃杀安阳王，兼其地。”

《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四“饮食部”二十“糠”条下记，“刘欣《交州记》曰：合浦海口有糠头山，传云：越王舂米于此，积糠而成”。

交趾和合浦都是汉武帝设岭南九郡的其中之一。与合浦一样，南越国时期交趾尚没有郡县设置，时属象郡地。赵佗征蜀国，不论是从海路或陆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都要经过合浦。

我们还可以就1983年挖掘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与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种类和型制来比较，就会从中发现合浦郡境地早在秦汉之间就与南越王国有着的紧密关系：

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锄、镢、锛、镰、斧、铤、手铲、铧、锥、刮刀、锤、凿等。其中锄是最常用的农具，主要在农耕时用于清除杂草，疏松土质等；镢是深掘土地的有力农具，主要用于荒造田、刨掘农作物的根株等。此外，当时收割农作物已经用到铁镰，砍伐森林已经用到铁斧，铁制家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南越国的农业发展。但由于南越国铁矿资源缺乏，冶铁业不发达，这些铁制农具主要还是依靠中原的输入，因此南越国的铁制农具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低，分布范围主要在南越国都

城和郡县治所的周边区域，而在一些离郡县治所较远的地方，仍在使用石器和青铜器家具。

合浦在 1985 年 5—7 月发掘了汉墓 5 座，其中 4 座地坑墓，有 3 座是同坟异穴的夫妻合葬墓，随葬品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陶器有罐、壶、灯；铜器有提梁壶、罍、承盘、釜、盆、杯、熏炉、壶、灯、镜、五铢钱、井、杵、臼；铁器三脚步架、剑。1984 年清理 2 座，都是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土随葬品有陶器瓮、鼎、壶、罐、甑、灶，铜器壶、钫、奩、釜、壶、镜，铁器釜、锤、刀，玛瑙串饰、玻璃珠。近年来，合浦配合高速公路建设，发掘了一批汉墓，从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铁制农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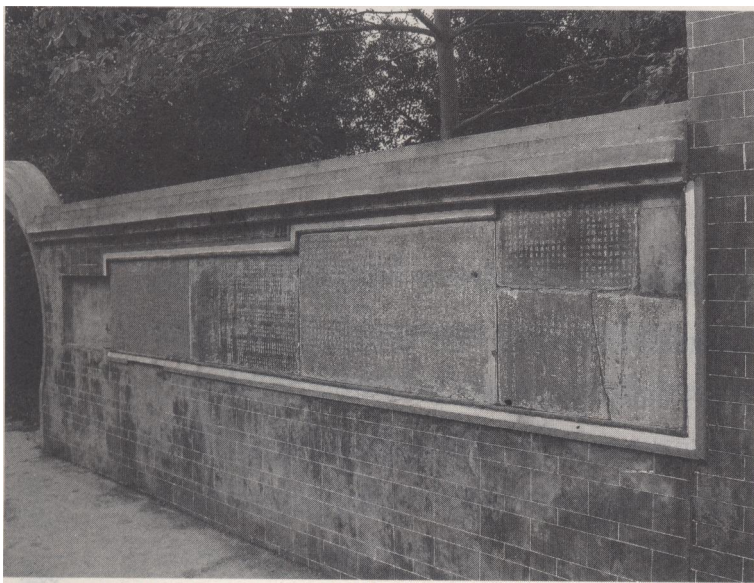


图 2-11

东山寺内的大量碑刻，记录了历代重建重修的人文事迹。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最多的器具是陶器，仅在南越王墓就出土陶器多达 991 件。南越国墓葬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储容器、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具，和专门为殉葬用的明器，以及一些建筑用的砖瓦等。这些陶器大部分为南越国本土制造，多是一些有着南越风格的几何印纹陶。

已发掘的合浦汉墓中，出土了有大批陶器，其中有许多器表饰以印纹、划纹和印纹上加戳印的陶器，有罐、瓮、壶等。如1975年堂排M2B西汉墓，出土的11件瓮，“在方格印纹上加圆形或方形、米字形、对角三角形印戳”。1984年凸鬼岭M201、M202西汉墓出土的12件罐，其中II式罐8件外腹部拍印方格纹，但戳印纹饰不同，有对角纹、网纹或方格纹、米字纹。合浦沿海一带发现许多古窑址，有汉、唐、宋、明、清各代的，说明合浦制陶业的历史悠久。位于合浦县廉州镇的草鞋村汉代窑址还发现许多方格形印纹上加圆形、方形戳印的陶片、瓦当、制陶工具和汉代水井。

此类陶器的残片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安志敏《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提到，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出土大量古代的陶片，这种陶片有印纹和划纹。英人威勒斯撰文记述其事，并附图介绍，内有四件印纹陶片。纹饰为编织纹，重叠菱形纹，及在一般印纹上加戳印记号。一些学者认为，柔佛州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划纹硬陶，可以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所发现的印纹陶器中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在一般印纹的基础上加戳印记号的艺术手法，普遍出现于两广汉墓出土的陶器上。在合浦汉墓出土的众多的这类陶器，正好印证了汉代合浦港与马来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频繁往来。汉朝商业使团输出的商品中或携带的生活用品中，应有合浦生产的陶器。

南越王墓出土的酒具有青白玉角杯。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黍、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出土的瓜果主要有柑橘、桃、李、荔枝、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姜、花椒、梅、杨梅、酸枣等。其中水稻是古越人的主要粮食作物，非常适合岭

南地区高温多雨，水源众多的生长环境。而荔枝是岭南特有的水果，据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赵佗曾将荔枝作为贡品进贡给刘邦。在南越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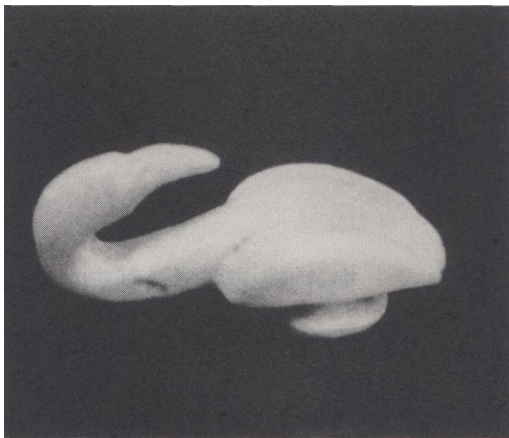


图 2-12
合浦汉墓出土的鸭首玉带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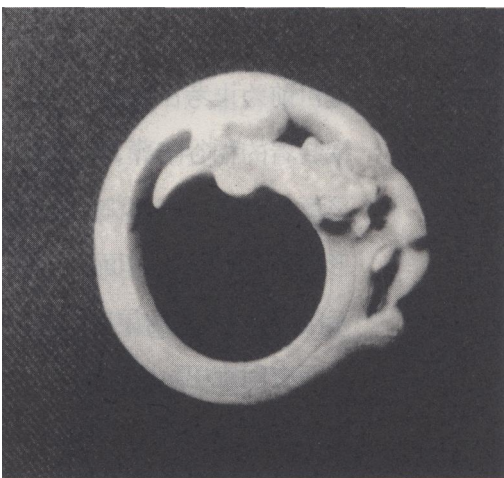


图 2-13
合浦汉墓出土的龙凤玉带钩。

1975年在合浦堂排汉墓出土一件铜锅，内装荔枝，果壳、内核完好，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合浦西汉晚期墓中看到有用铜锅装着的稻谷陪葬，还出现大量粮仓、粮囤模型明器。粮仓模型明器几乎每一座墓都有，反映当时粮食储备相当可观。这些粮仓平面都是长方形，像一

间平房，前面有一道或两道门，门槛很高，其他三面密闭，无窗无门，和住人的房屋有明显的区别。堂排汉墓一件陶仓长方形，一大间，前面有回廊，悬山式瓦顶，瓦脊偏后，瓦面呈前宽后窄，使前檐覆过回廊，开门道，面阔3间，进深2间，四面墙体刻划出柱枋结构，正脊和垂脊都有博古装饰。风门岭M48出土陶仓盛金黄色的稻谷。有的粮仓高架起来，成为干栏建筑。如望牛岭1号墓出土的铜仓，一大间，置于平台上，平台下有8根立柱，将整座建筑平地托起。仓房前壁正中有门，门为双扇，各有门环，左右开启。门下有槛。悬山顶，前后各有12道瓦垄，屋檐向前后伸出，盖过壁墙。仓前有避风雨的回廊，回廊前缘有栏杆，十分讲究。黄泥岗1号墓铜仓，也是一大间，正面开单扇门，其他三面板壁封闭，人字坡瓦顶，平底，下附四只高足将仓体顶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座仓房的门及左右板壁、两边山墙及后壁，都篆刻了精细的图案花纹，十分华丽。仓底用4条或6条立柱将仓体顶离地面，既能防潮，又可防鼠。汉代合浦人如此重视粮仓，说明当时粮食自给有余，已经有一定的储备了。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的家畜残骸主要有猪、牛、羊、鸡等，出土的野后动物残骸主要有禾花雀、竹鼠等。特别是禾花雀，至今在广东仍是一道名菜的主料。此外，南越国的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水产品，有鱼类、鳖类和种贝壳类的淡水和海水产品。

合浦堂排汉墓出土过稻谷。大量陶屋模型内都附有劳作俑，有的执杵舂米，有的端着簸箕簸米，可见当时的主要粮食是稻谷。

汉代农业还包括了畜禽的饲养。农民除了耕田种地，还大量饲养家畜家禽。猪、羊、牛、犬、鸡、鸭、鹅等畜禽模型明器在汉墓中屡见不鲜，

成了当时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一个重要标志。猪的饲养尤为普遍，从陶屋模型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猪圈，圈栏内的猪有多有少，少则一二头，多则四五头；有肉猪，也有带仔的母猪；猪的姿态，有静卧的，也有吃食的，还有喂奶的，形象逼真。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陶屋，猪圈内就有肥猪5头。有的陶屋猪圈内鸭、鹅等模型数量就更多，论质料言，有陶的，也有铜的，猪还有滑石的，鹅则有玛瑙雕琢的。

考古发掘证明岭南地区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并掌握了原始的青铜铸造技术，但当时青铜器的应用并不广泛。秦始皇统一岭南和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来自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使岭南地区的冶铸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仅在南越王墓和罗泊湾一号墓两个南越国的墓葬中就分别出土了500多件和200多件的青铜器。在这些青铜器中，除了一部分兵器和日常用具是从中原输入之外，很大一部分是南越国自身铸造的，主要有铜勾、越式铜鼎、铜提筒、铜熏炉、铜鼓、铜壶、铜烤炉、铜釜、铜编钟、铜钲、竹节铜筒、铜羊角钟等。其中的一些铜器体型硕大，胎壁较薄，铸有各式繁杂的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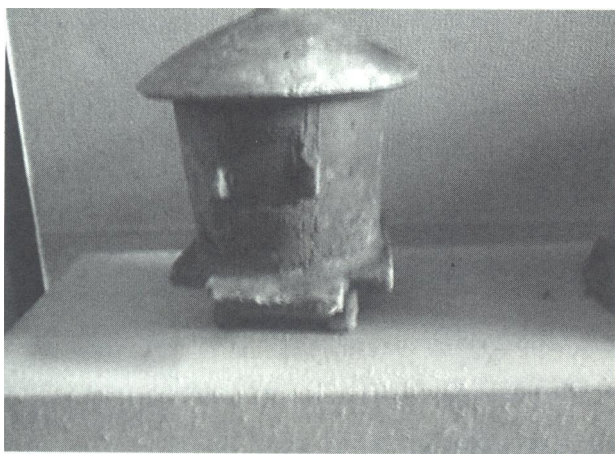


图 2-14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谷仓。

1985年6—7月合浦发掘8座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罐、壶、鼎、灯、屋、灶、井；铜器罍、盆、碗、盒、釜、奩、提梁壶、锥壶、杯、熏炉、杵、白、灶、镜、环首刀、矛、戟、五铢钱；铁器三脚架、剑；滑石器鼎、罐、钫、灶、井。在一座西汉晚期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锥壶肩部刻划“西于”2字。1986年春又发掘10多座，其中10号墓是一座新莽时期的砖室墓，随葬大量的陶器、铜器和佩饰品。陶器有罐、坛、提桶、灶、井、屋、仓；铜器有鼎、壶、提梁壶、锥壶、碗、盘、樽、熏炉、灯、镜等；装饰品有金戒指、金花球、银戒指、玛瑙珠、琉璃珠、水晶珠、玉玲、玉填、玉塞、玉猪等。2003年11—12月再发掘4座，其中26号墓是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由墓道、椁室及外藏椁组成，椁室周围用白膏泥封护，棺位于墓室后部西侧，已腐朽，朽痕上散落着琉璃串珠、铜钱、玉璧、鼻塞、耳珰等物。棺前有头箱，置日常生活用品，以铜器为主，计有碗、钵、盘、杯、樽、盒、灯等；边箱与棺等长，置大量铜器和陶器，铜器有鼎、壶、钫、簋、盆、釜、釜、提梁壶、长颈壶、锥壶、熏炉、杵白等日常生活用品和井、灶、狗、禽鸟、俑等模型明器，陶器有屋、仓、灶、瓮、壶、罐、五联罐等。部分器物内有植物种实及其他残留物，一鼎内有鱼骨，铜井内有提桶，铜灶上有锅。墓室前部有拉车铜马、铜仓，仓顶上有鸟、鹅、鸡、蛙、鱼等青铜小动物饰件。外藏椁位于墓道底部与墓室相连处，置铜牛和大陶瓮1件，也应是郡守官吏的墓葬。

南越国的玉器制造业也相当发达，在南越王墓中共出土244件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分为四大类，包括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器用玉等，器型丰富，用途多样。其中的精品主要有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

承盘高足杯、玉璧、龙虎并体玉带钩、龙凤纹重环玉佩等。这些精美的玉器大部分为南越国的工匠制造，而玉料除了由南越国自产一部分之外，很大一部分则来自于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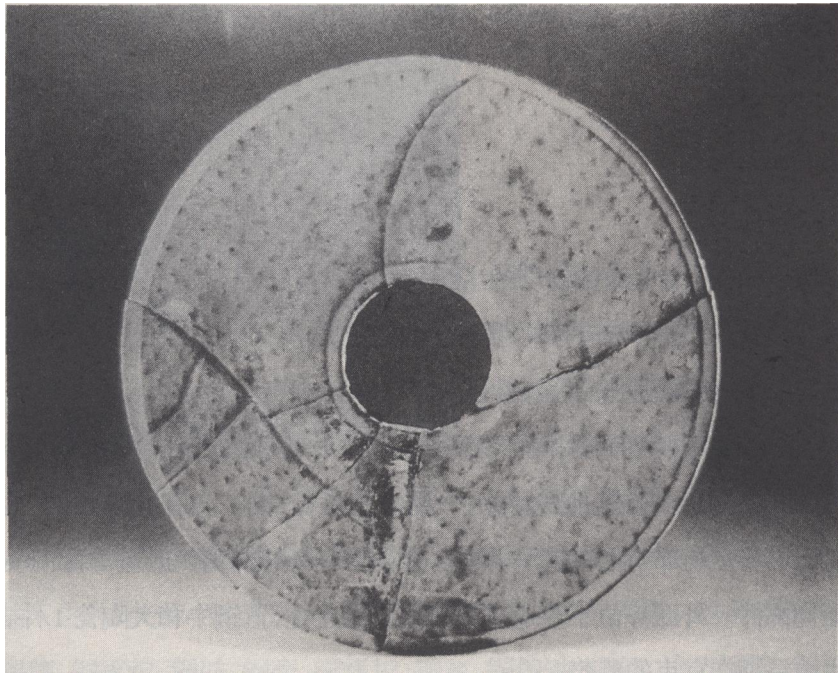


图 2-15
合浦汉墓出土的精美谷纹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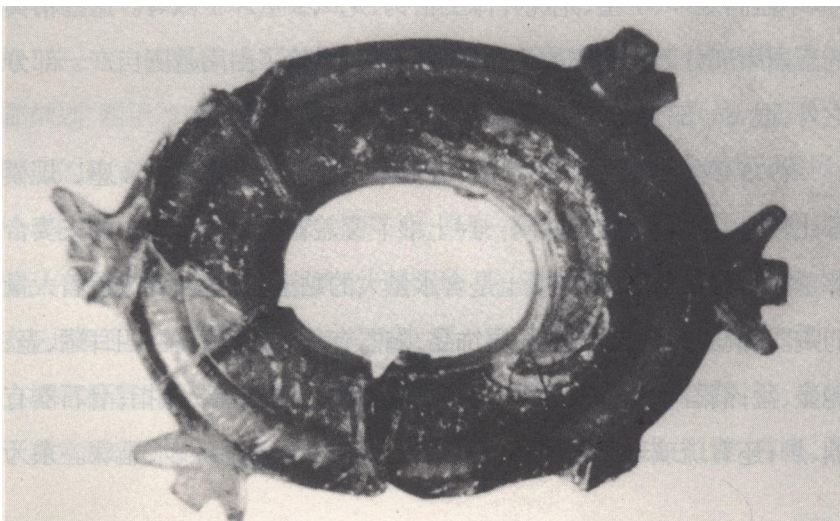


图 2-16
合浦汉墓出土的琉璃环，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口商品种类的见证。

1975 年秋广州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合浦发掘汉墓 4 座，规模都比

较大，其中2号墓在同一封土堆下覆盖着两个并排墓穴的夫妻合葬墓。有斜坡墓道，墓坑填土是含水量大的黏土，棺室内外放置着大量的陶器、铜器、滑石器和玉石佩饰品，陶器有瓮、罐、双耳罐、四耳罐、壶、匏壶、盆；铜器有簋、盆、甗、灯、镜；铁器有削；金器有镯、戒指；滑石器有鼎、炉；还有琉璃珠、琥珀狮、骨珠、玛瑙珠、肉红石髓珠、水晶珠。东为M2B，有斜坡形墓道，墓道左侧又辟一个带窄甬道的耳室。墓室内填五花土，层层夯实，底铺一层木炭，木炭层下铺一层细沙，有纵向枕木沟2条。棺槨已废，但痕迹可辨，随葬品大量摆置在棺的右侧与槨壁之间。计有陶器瓮、罐、壶；铜器鼎、壶、长颈壶、簋、盆、钵、奩、锥壶、熏炉、锅、镯、灶、灯、镜、带钩、剑、矛、车戟；铁器刀、锄；还有漆耳杯、黛砚、琉璃珠、琉璃管、水晶珠、琥珀珠、玛瑙珠、玛瑙鹅、肉红石道珠、肉红石髓狮；1990年合浦发掘的东汉初期的砖室木槨墓，随葬品异常丰富，计有铜器、陶器、玉石器，包括铜器壶、碗、釜、蒸酒器、灯、镜、剑和铜制明器仓、灶、井等；陶器有罐、壶、和明器陶屋；玉器有出廓璧、母子带钩、蝉形珮。蟠螭纹珮、还有玻璃杯、玻璃串珠、水晶串珠、玛瑙串珠、琥珀串等。

南越国的金银器冶铸业、纺织业、漆木制造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代表作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泰子”龟钮金印、虎头金钩衔玉龙、金带钩等。出土的漆器代表作有漆木大屏风等。

合浦一座汉墓中发现有印章2枚，一枚龟钮铜印，阴文篆书“陈褒”；一枚滑石印，刻“徐闻令印”4字。墓主是徐闻县令陈褒。其中有一件“劳邑执珪”琥珀印，说明墓主人可能原是劳邑部族首领，曾被封为执珪，相

当于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戍该地的武官。

除了陆路贸易之外，南越国的海上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据位于今广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都城番禺已具备了生产大批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船只的能力。当时的南越国人已经开辟了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后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南越王墓的遗址中，也发掘了一部分产自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舶来品，包括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等。



图 2-17

合浦汉墓出土的“马面形”托灯陶俑。

合浦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1995 年北插江 4 号墓出土的金花球。两墓分别出土 8 件 14 件，金花球造型基本相同，直径 1.2 至 0.8 厘米，空心，外层用细金丝联结粟米大的金珠构成，非常精致。1996 年经中国历史博物

馆馆长俞伟超先生鉴定，认为其造型风格是印度的，应是从印度输入的。

合浦望牛岭的一号西汉墓出土金饼两个，其分别雕刻有“大”、“阮”字样，是金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交易流通货币的重要物证。

已发掘的汉墓，许多都有铜、陶质的熏炉（燃放香料专门用具）。如望牛岭一号西汉墓、北插江一号西汉墓、黄泥岗一号新朝墓、风门岭十号东汉墓均各出土一对铜博山炉（熏炉）。堂排 M2B 西汉墓出土铜熏炉一件，“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这意味着汉代香料的使用在合浦已非常普遍。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龙脑香，这说明汉朝从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商品中含有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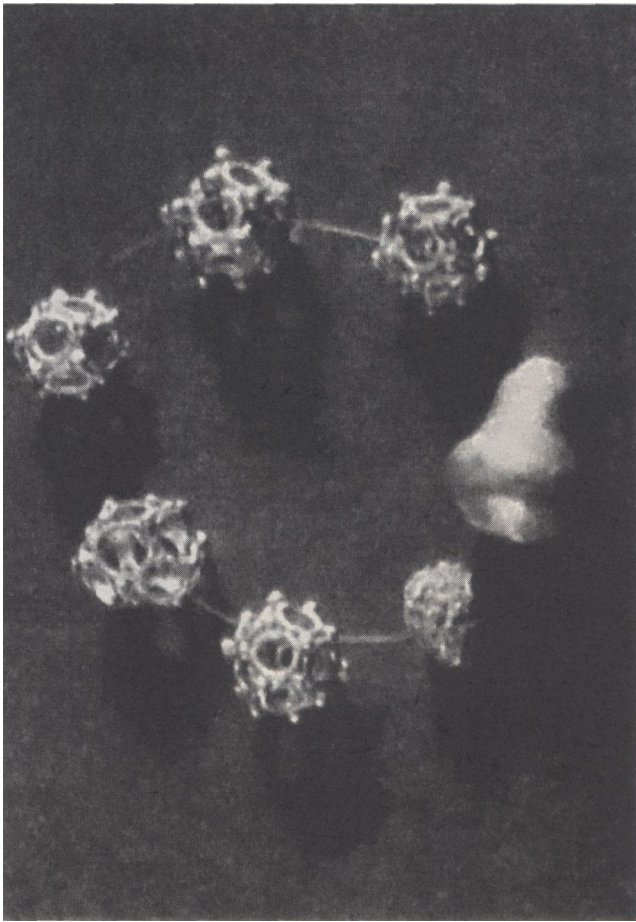


图 2-18

合浦汉墓出土的金花球。

2003年11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合浦进行汉墓抢救发掘时，在一座汉墓中也发现有一种碳化的香料。合浦汉墓所出燃香之器熏炉有铜质和陶质两种。熏炉的盖镂空，作重叠云雾山峰纹饰，顶有活环钮，系活链，与腹部环钮连接，圆盘身，喇叭形座，有的下有承盘。望牛岭、堂排、风门岭、九只岭汉墓都出过铜熏炉，风门岭、文昌塔、母猪岭、凸鬼岭20号墓陶熏炉盖面镂长方形气孔，顶有背向卷云状钮。贵港、梧州、兴安汉墓也有铜熏炉和陶熏炉出土，说明当时燃熏香料已成为社会上层人士奢靡生活的时尚。中国不产香料，这些香料主要从东南亚等海外舶来。

在合浦东汉墓中出土过“胡人”陶俑。如堂排号墓出土的舞俑，竖目，小眼，络腮胡须，应是胡人，1982年贵县（今贵港）铁路新村3号墓出土的人俑活动流陶壶，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全身体毛发达，头戴圆顶帽，完全是胡人形象。梧州汉墓出土的持灯俑也是胡人形象；兴安石马坪汉墓出土的陶俑，左腿向内横屈，右腿屈膝垂立，高鼻，深目，大耳，刻划有须，胸有双乳突，胸背多毛，也应是胡人。据《广州汉墓》一书考证，从体形特征来看，他们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这种陶俑大概即杨孚《异物志》所称的“瓮人”。公元前2世纪前后，已有不少印度人移至印尼，他们与当地部族首领结合，在沿海一些地方建立起奴隶制王国，有些土著居民被奴隶主当作商品往外贩卖。中国南海船队回程航线由黄支经皮宗回国，这些胡人，一种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另一种可能是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

近年广西区文物工作队在合浦汉墓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又发现了一座蹲坐的铜俑，其造型与陶俑相似，由此可知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合浦港是第一站。

从合浦汉墓的出土文物与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合浦郡境地虽然在秦王朝及南越王国时期还没有正式的行政区域设置及名号。但与在南越王国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和活跃的。合浦作为这一区域的物流中心，承担起民间商贸往来的中转或支点作用。正是因为合浦郡境地在先秦时期，特别是在南越王国时期已经具备了这种区位优势，因此，汉武帝经过七次巡海之后，建立并确定了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图 2-19

合浦汉墓考古发掘出的铜俑。